

# 董誥與乾隆皇帝的代寫佳話

樓秋華

## 兼談書畫代筆

清乾隆皇帝在〈快雪時晴帖〉前後御題時逾半紀，多達七十七處，並畫兩幅，一直為藝林所津津樂道。而其中三處御題系其近臣董誥代寫，卻少有人專門論述，即使提及，也往往與代筆混為一談。事實上，代寫與代筆（捉刀）迥然有別、界限清晰。同時，乾隆皇帝所謂「命董誥代寫，亦佳話也！」不僅具有其真實的精神內涵，而且也是對「代筆」事由的深刻警醒。

### 代寫佳話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冬，正當《石渠寶笈》續編行將成書之際，年過八旬的乾隆皇帝，因「詩字多，艱於細書」，而在〈快雪時晴帖〉冊中題寫道：

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鏡。今歲詩字多，艱於細書，命董誥代寫，亦佳話也！御識。（圖一）

由此，是年五十四歲的董誥（一七四〇—一八一八）被乾隆帝欽點為「代寫」人。隨後的三年間，他在〈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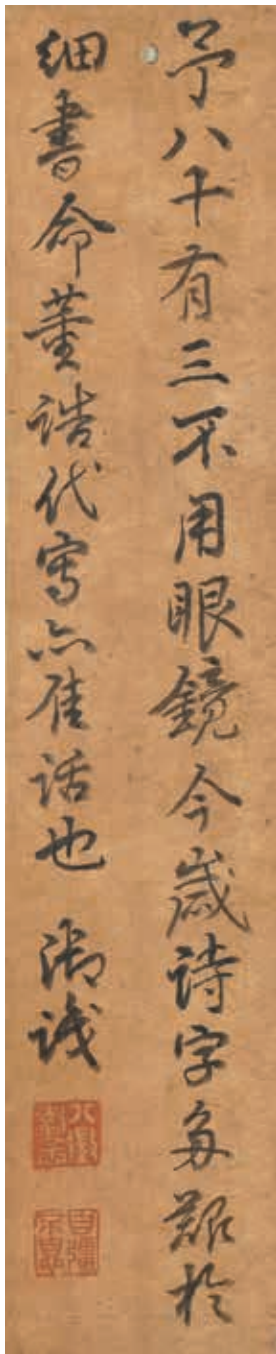
雪時晴帖〉冊中先後三次代寫御製詩，其中包括癸丑（一七九三）冬至月、甲寅（一七九四）臘月、乙卯（一七九五）孟冬月各一首。

絮雲濃午末，稷雪落申初：翹首時晴晦，益增嗟以噓。御製雪六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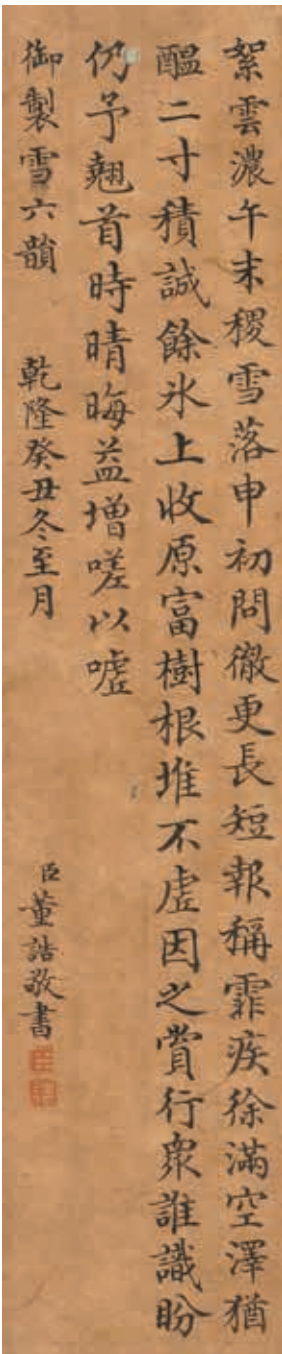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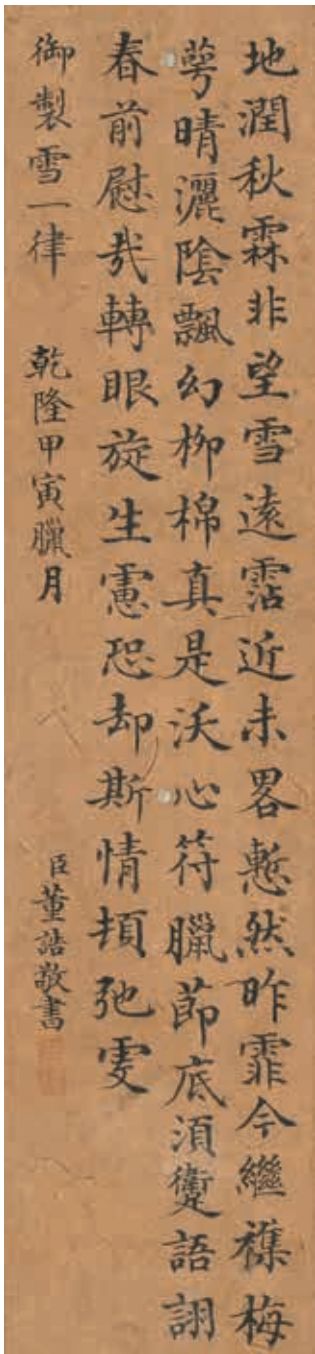
臣董誥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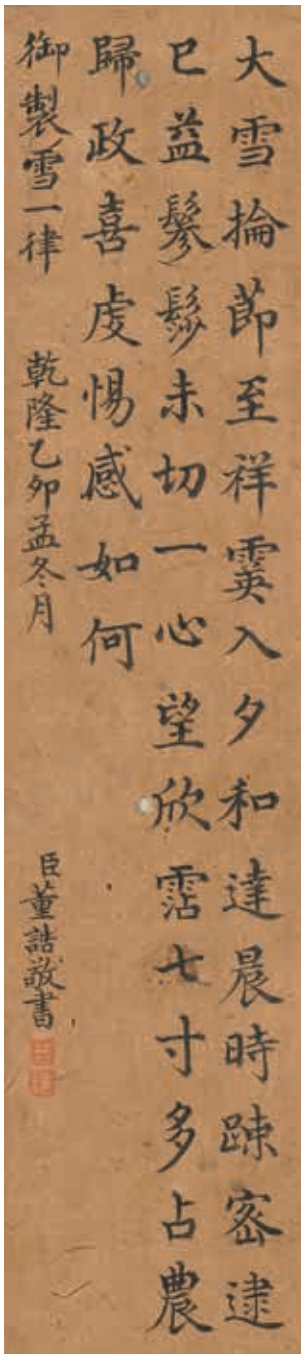
圖一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乾隆58年御題 董誥代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1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乾隆58年御題 董誥代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2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乾隆59年御題 董誥代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3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乾隆60年御題 董誥代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癸丑冬至月，臣董誥敬書。

(圖二-1)

地潤秋霖非望雪，遠霑近未略慙然：慰哉轉眼旋生慮，恐卻斯情頓馳度。御製雪一律，乾隆甲寅臘月，臣董誥敬書。(圖二-2)

大雪掄節至，祥雲入夕和：占農歸政後，虔惕感如何？御製雪一律，乾隆乙卯孟冬月，臣董誥敬書。(圖二-3)

可見，「御製：乾隆某年某月，臣某某敬書」成爲董誥代寫署款的固定格式，並無例外。應該說，此類君臣之間的「代寫」關係與一般意義上的「代筆」之謂迥然有別。確而言之，乃是「代爲書寫」之意，這其實也是作爲詞臣的一大職責。至於所代爲書寫的御製詩是否完全出自乾隆皇帝本人，則是另外一回事。事實上，在乾隆十年以前乾隆皇帝自身書法尚未成熟之時，其御製詩中也有不少

分別由陳邦彥、張照、梁詩正等「代寫」之，而且款署「乾隆某年某月御題，臣某某敬書」，大體成爲樣式。

(註二)除了上述三人，錢陳群、劉統勳、嵇璜、袁日修、陳孝泳、于敏中、董誥等人也先後成爲乾隆皇帝詩文的代寫人，常見「乾隆御製(識)，臣某某奉敕敬書」，乃是另一種基本樣式，這在《石渠寶笈》續編「本朝臣工書畫」中均有著錄。所以從書法角度而言，這類書跡作者之歸屬清晰可辨，並不存在「代筆」、「捉刀」之類所帶來的真偽紛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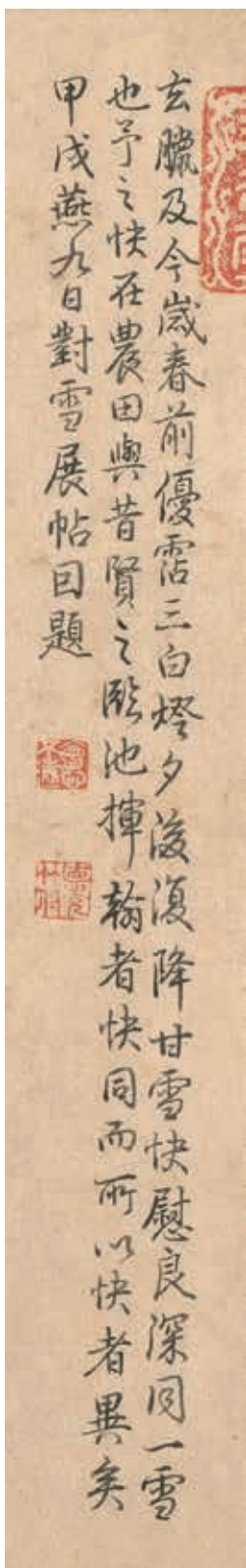
然而，最近有論者竟將此類「代寫」情形表述爲諸如「董誥還被認定爲乾隆皇帝晚年的主要代筆人」、「代筆作詩」等等，從而與書畫研究領域的「代筆」現象混爲一談，未免有失妥當，容易引起誤讀。

其實，乾隆皇帝當年對此類誤讀已經有所提及，並對「捉刀」一詞先後兩次予以考訂。第一次便是辛亥年(一七九一)所作的「捉刀」詩(註二)。此詩開頭：「俗以代人者，稱

之曰「捉刀」。蓋祖宋《新語》，義慶之紀曹。」中間則寫道：「然此說謬悠，不足欺人清。而亦成顛倒，「捉」、「坐」賓主擾。」最後乾隆皇帝認爲：「前段已涉僞，後段尤偷桃。操奸故所鄙，劉記徒增嘲。」而在此詩的附注中，乾隆皇帝引述了劉義慶在《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篇中關於「捉刀」一事的全文，並加以辨析：「如果有此事，操之忌刻、輕佻爲己甚。然追殺使者，豈不啓覺匈奴，操必不爲此，足知《新語》之覺說耳。」可見他也如同唐人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一般，明確否定了此事的真實性。

乾隆皇帝第二次關於「捉刀」典故的闡述，乃是在乙卯冬最後一次御題〈快雪時晴帖〉之後。他不僅在詩中再次引用捉刀一詞，並在此詩的附注中作如此考訂：

按「捉刀」之事，見劉義慶《世說新語》載「魏武將見匈奴使者，自以不足雄遠，因令崔季珪代帝，而帝自捉刀立床頭。」稽其事實，是



圖五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乾隆19年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內府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真跡，每歲得雪成什，即書之冊中，以徵佳瑞。數十年來，書冊幾遍。前歲癸丑，因詩字較多，字體逾小，命董誥代書之，凡三年矣。今番應節恩雪既溥，且早雖命董誥書詩冊內，復成此短句，勉力仍手書之。然此後既歸政，冊內不復涉筆

矣：（註五）  
由此可見，乾隆皇帝之於〈快雪時晴帖〉，其實不惟將此帖視為天下第一名跡，而且他還視此帖為大清祥瑞之物！因此，自丙寅（一七四六）之後，他「每歲得雪成什，即書之冊中，以徵佳瑞。」這就意味著，當他在此帖中「依例題句」，已成其為天下祈福的重要象徵。如此非同尋常的御題，自然必須親力親為。然而，歲月不饒人，當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因「今歲詩字多」而「艱於細書」之時，他不得不欽命近臣董誥為其代寫，並寫下了「亦佳話也」的由衷感歎。

事實上，乾隆皇帝早在甲戌（一七五四）燕九日的題句中，就已經表  
顯然，他在〈快雪時晴帖〉冊年復一年地御題「雪」詩，正是其以「書畫為寄情」而實則「勤政愛民」的具  
六）

諸如此類，一題再題。我們不妨再回到乙卯冬乾隆皇帝在〈快雪時晴帖〉冊中御題「雪」詩：  
老矣三年命捉刀，祥雲應節霽恩豪。獲麟釐汭近上日，七字因之重涉毫。（圖四）  
正是在這首詩的附注中，他敘述了在三年前命董誥代寫「亦佳話也！」的眞正緣由。他說：

老矣三年命捉刀，祥雲應節霽恩豪。獲麟釐汭近上日，七字因之重涉毫。（圖四）

然而，既然詞臣們為乾隆皇帝「代寫」早已屬司空見慣之事，則又緣何在癸丑冬命董誥代寫時，他卻特拈出「亦佳話也！」的「御識」，況且董誥在此之前已是其代寫人之一。（註四）個中原因無疑值得我們進一步予以探究。

明其在〈快雪時晴帖〉冊中題「雪」詩的本意之所在，他認為：「同一雪也，予之快在農田，與昔賢之臨池揮翰者快同，而所以快者異矣。」（圖五）此類題記，在是冊前後一再出現。而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的序文中，乾隆皇帝更是對其雅好書畫之道作了如下闡述：  
然予之此舉實因志過，而非誇博古也。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雖考古、書畫為寄情雅致之為，較溺於聲色貨利為差勝。然與其用志於此，孰若用志于勤政愛民乎！（註六）

以崔代曹，而曹之「捉刀」，乃假為侍臣，非曹代崔也。後人乃以倩代為捉刀，轉致賓主互淆，而自來引用從無辨及者，向曾有詩正之（在辛亥年）。予嘗謂讀書不求甚解，在淵明自寫胸臆則可，至於格物明理，不應如是疏略。雖文人相沿既久，臨文不妨襲用，然亦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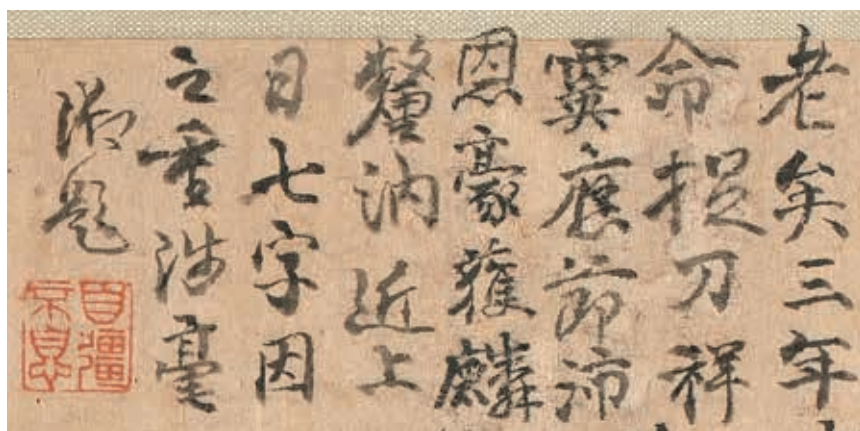
遠在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前  
不致辨也。茲因用此二字，複識及之。（註三）  
顯然，乾隆皇帝對於「捉刀」一典及其傳衍具有清晰的思辨。這其實也直接表明了他之於詞臣們為其代寫御製詩文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三年前他命董誥代寫的確切態度。

後，乾隆皇帝已經在〈快雪時晴帖〉中反覆題贊：  
琳琅球璧，世間所有。若此帖乃希世珍耳。（圖三-1）  
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圖三-2）  
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圖三-3）

- 圖三-1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約乾隆11年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三-2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約乾隆11年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三-3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約乾隆13年後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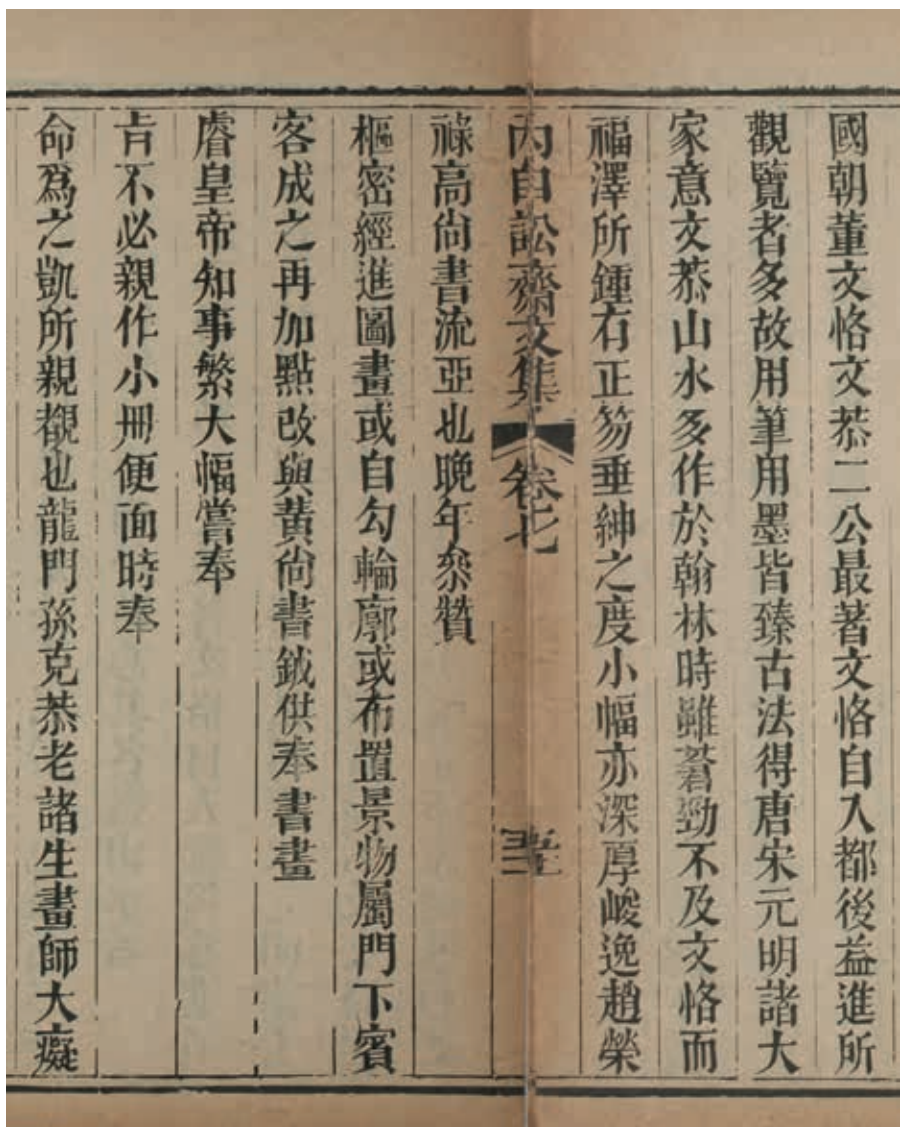


圖三-1 圖三-2 圖三-3



圖四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乾隆60年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復層既亦不後起後矣



圖六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乾隆 60年後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體展現。據筆者初步檢視，自丙寅（一七四六）至乙卯（一七九五）整整五十年，僅缺戊辰（一七四八）、辛未（一七五一）、戊寅（一七五八）、己丑（一七六九）等四五個年份，或因特殊原因或因無雪而未題。如是冊中有己卯（一七五九）臘月十一日御筆「去歲三冬無雪，今年小春及長至月再集祥雲」云云。

因此，當乾隆皇帝將於丙辰（一七九六）正月歸政前夕，喜迎瑞雪而「慶協農占，感沐鴻釐，更難言喻」，終不顧年老體衰，「勉力仍手書之」，再次親筆御題。他還說：

此番瑞雪已作五律志喜，且冊中紙幅已滿，明冬慶露時玉即可不復依例題句。仰荷吳恩，即此翰墨亦幸得全域，爰復拈毫題冊，以志欣感。（註七）

由此我們可以識見，董誥在《快雪時晴帖》冊中連續三年代寫乾隆五十八年冬至月廿九日、乾隆五十九年臘月廿五日、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御製「雪」詩，顯然與以往詞臣們的

圖七 周凱 《富陽畫山水者記》 局部 引自《內自訟齋文集》 道光20年刊本

「代寫」意義全然不同，這也就無怪乎乾隆皇帝對此一再感歎！  
而當他最後題上「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圖六），也為董誥的「代寫佳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 代寫與代筆

眾所周知，「捉刀」也好，「代筆」也罷，一般借指代作詩文，隱去真正的作者，而以自己的名義行世。在書畫研究領域，「代筆」與「捉刀」則專指請人代作書畫，而署以「作者」自己的名款以及鈐印後行世。儘管具體情形頗為複雜、手法不一，或在真偽之間，或在真偽之外，但其實質總歸一致。

換言之，「代寫」仍署書者名款，詩文作者亦不變，兩者涇渭分明。此類情形尤常見於分工明確的傳世碑文，諸如「某某制文，某某書丹」之類。而「代筆」、「捉刀」則不然，或欺世盜名，或越俎代庖，或曲意阿逢，或憑附增價，可謂代不乏人。

極有意思的是，董誥不僅曾是乾隆帝欽命的「代寫」之人，而且十幾年之後，在他自身位高權重「事繁之際，成為嘉慶帝許可的被「代筆」之人。

據曾出入並寓居董誥府邸多年的周凱（一七七九—一八三七）在其《富陽畫山水者記》一文中如此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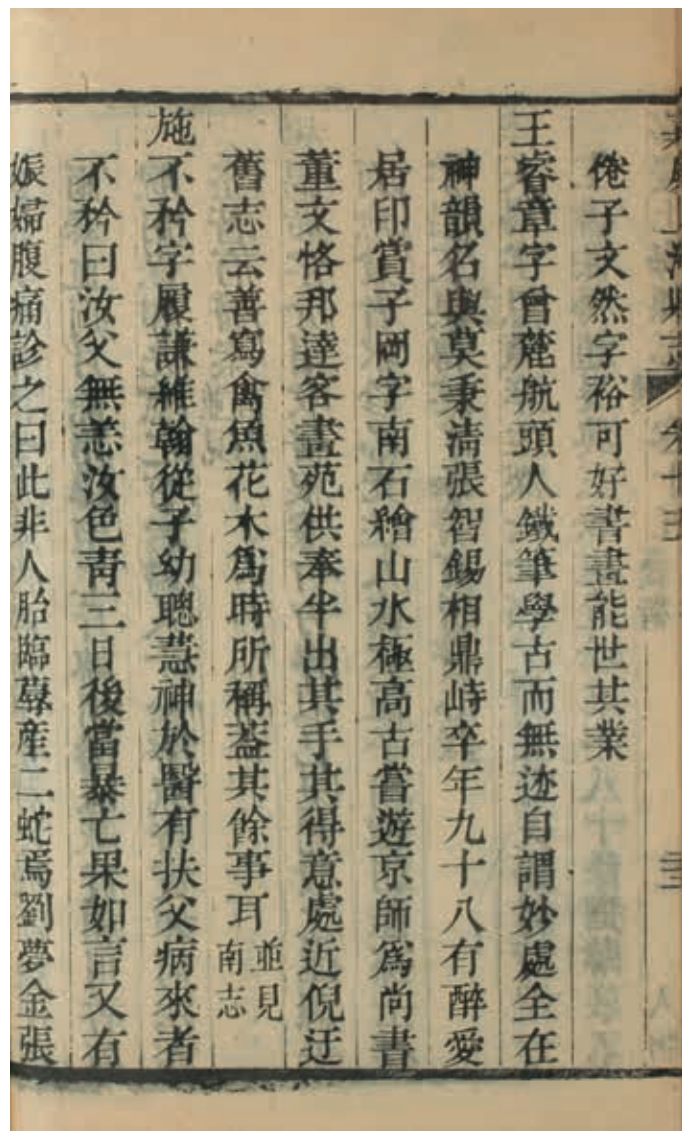
文恭（按董誥）山水多作于翰林時，雖蒼勁不及文恪，而福澤所鐘，有正笏垂紳之度。小幅亦深厚峻逸，趙榮祿、高尚書流亞也。晚年參贊樞密，經進圖畫，或自勾輪廓或佈置景物，屬門下賓客成之，再加點改，與黃尚書鉞供奉書畫。睿皇帝知事繁，大幅嘗奉旨不必親作；小冊、便面，時奉命為之，凱所親睹也。（圖七）

而據周凱《芸皋先生自纂年譜》，則可知其自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至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間或寓寄董誥門下，前後共計約三年有餘。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其「親睹

也」當在此時際。

顯然，「睿皇帝知（董誥）事繁，大幅嘗奉旨不必親作」一類情形，絕不會僅限於董誥一人，而應是那些身居高位，或分身無術或年老體衰的宮廷詞臣畫家中間較為普遍的現象。同時，由於詞臣畫家一般屬文人畫範疇，與精於體物寫形的畫工畫差別較大，往往拙於繪寫一時一地歌功頌德之實景，這當然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事實上，由於乾隆帝對於繪事頗為重視，所以宮廷畫家往往有奉旨起稿，爾後進呈稿本，然後再奉旨照樣准畫等一套嚴格程序。有時連詞臣畫家也未能倖免，正是在奉旨「照樣准畫」的過程中，其中不乏由門客代筆之作。

董誥生父董邦達（一六九六—一七六九），作為一般詞臣奉命與皇帝詩詞唱和之外，還多次應命為乾隆皇帝所寶愛的歷代名作配畫，或引首或拖尾。正如董氏在王珣《伯遠帖》卷尾配畫上如此題述：「上既以王氏三帖貯三希堂，詔臣達繪為圖：竊念



圖八 《上海縣志》 卷15 嘉慶丙子（1816）孟春虛室校刻本 浙江圖書館藏

世不遠，可信度頗高。更何況此時董誥正位重權高，身居大學士之位已整整十八年，其父董文恪生平清名豈能容他人信口雌黃。所以我們有必要依據諸如王岡「其得意處近倪迂」的畫風，來重新審讀董邦達名下的傳世之作。可惜的是，當年也曾「為時所稱」的王氏於今已難覓其筆墨蹤跡，身謝道衰。檢視《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等大型文獻，王氏之作已銷聲匿跡。就書畫考辨而論，問題更在於如王岡這類代筆人，一旦以已作從寄居府邸流出，成爲一種非常特殊的託名之作，那麼此類「代筆」理應視同作偽。

結語

在以往的古書畫研究中，蔣廷錫、錢維城等詞臣畫家均被認定有代筆之人，實屬情理之中。因此，正如周凱所記「小冊、便面，時奉命爲之」，這些便於君臣之間「唱和」詩情畫意的小件之作，無疑是更爲可靠的「真跡」。而詞臣畫家所經進寫形

希世珍奇，屢得附名其後，簪筆之榮，實深蹈扞。」董氏作爲乾隆帝盛年時期抬愛有加的山水畫家，同樣也未能擺脫曾有門客爲之「代筆」的經歷。

據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六）《嘉慶上海縣志》卷十五「藝術·人物」記載：

王容章：字南石，繪山水極高古。嘗游京師，爲尚書董文恪邦達客，畫苑供奉半出其手，其得意處近倪迂。舊志云，善寫禽魚花木，爲時所稱。蓋其餘事耳。並見《南志》。（註八）（圖八）

應該說，該志所記，距董邦達、王岡（一六九七—一七七〇）二人離

嚴謹、用筆工致的鴻篇巨製則往往由其門客代筆，只是得到皇帝許可，也就無所謂欺君與否了，董氏父子與其門客之間的代筆關係自然應屬此類。

僅就此而言，乾隆帝當年認爲他命董誥代寫「亦佳話也！」，確也非誇大其詞。至少相對於一般意義上的

「代筆」、「捉刀」之類而言，書寫者自署其名的「代寫」無疑要正大光明的多！

值得一提的是，董邦達與董誥先後得到乾隆帝的抬愛，兩代詞臣，一時顯赫，這自然與乾隆皇帝喜愛書畫之雅好密不可分。而且筆者進而認

爲，由於乾隆帝對於《富春山居圖》的一再追慕與真偽心結，更使得作爲富陽人的董氏父子與其自然而然地成就了一段異乎尋常的翰墨因緣。（註九）

作者爲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研究員

- 注釋
1. 可參見《石渠寶笈》初編〈貯乾清宮〉卷五「元倪瓚〈水竹居圖〉」條、「貯養心殿」卷六「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條、「貯養心殿」卷八「王原祁仿李成筆畫一軸」條等相關著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六九）。
  2.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卷六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四年影印本，第一三〇冊，頁六三五。
  3. 《御製詩五集》卷一百，《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二冊，頁五二一。
  4. 《石渠寶笈》續編，「董誥書《御製錦雲民駿歌並圖》」條。又，董氏日後還是嘉慶帝的代寫人之一。

5. 《御製詩五集》卷一百，《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二冊，頁五一，該詩墨蹟「近」字（見圖四）在詩集中改爲「迎」。按此時乾隆皇帝確已是人書俱老，盡失往日穩健之風。而拙文完稿後得見陳保真《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一文，甚爲欽佩。惜陳文中偶有舛誤，全文約三十處。如將「今歲詩字多，艱於細書」誤作「今歲詩

6.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同註一。
7. 同註三。
8. 該志卷十五，頁三一。按此處「舊志」即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上海縣志》；「南志」即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南匯新縣志》，該志第十三卷「藝術·人物」簡要述及王岡「工花鳥蟲魚，寫生入妙」云云。
9. 按自雍正七年（一七二九）進入戶部直至乾隆九年（一七四四）整整十五年間，董邦達在仕途上幾無建樹。而自從乾隆九年參與《石渠寶笈》初編，尤其是乾隆十年冬乾隆皇帝收得《富春山居圖》（子明本）之後，五十歲的董邦達在仕途上便很快變得通達起來，晚年則直接陞及其長子董誥。又，乾隆皇帝之於《富春山居圖》真

1. 乾隆皇帝，《樂善堂全集》自序，乾隆二年（一七三二）武英殿刊本。
2.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二十，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刊本。
3.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〇二冊。
4.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〇、一三一冊。
5. 《清史稿》卷一八一，「大學士年表二」。
6. 周凱，《內自訟齋文集》卷七，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刊本。
7. 徐邦達，《古書畫鑒定概論》，頁八九，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
8. 楊伯達，《清代院畫》，頁四八—五七，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三。

參考文獻

1. 乾隆皇帝，《樂善堂全集》自序，乾隆二年（一七三二）武英殿刊本。
2.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二十，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刊本。
3.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〇二冊。
4.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〇、一三一冊。
5. 《清史稿》卷一八一，「大學士年表二」。
6. 周凱，《內自訟齋文集》卷七，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刊本。
7. 徐邦達，《古書畫鑒定概論》，頁八九，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
8. 楊伯達，《清代院畫》，頁四八—五七，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三。